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 关系研究

A Study 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

张绪山 著

中华书局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 关系研究

张绪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 / 张绪山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101- 08135 - 0

I. 中… II. 张…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拜占庭帝国 IV. D829.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171165 号

书 名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

著 者 张绪山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¼ 插页 2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08135 - 0

定 价 69.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
项目批准号 01JA770056

前 言

一、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变化： 拜占庭帝国的形成

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实际上是由希腊文化区和拉丁文化区两个部分组成。希腊文化区主要掩及地中海东岸,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这一地区长期盛行希腊文化,居民大多使用希腊语交流,城市集中,人口密集,商贸繁荣,在许多方面优越于地中海西部的拉丁文化区。罗马帝国的兴起及其对地中海东部的征服,确立了拉丁文化区对希腊文化区的统治,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强有力的统治和经济繁荣,掩盖了两个文化区的差异,但二者的区别仍然存在。^①

3世纪的社会危机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对于罗马帝国具有决定性影响,主要表现之一,是作为政治中心的西部拉丁文化区的衰落和东部希腊文化区的重新崛起。罗马帝国内部的社会危机和蛮族入侵的洪流动摇了帝国的统治。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305)的改革被认为是危机的转折点,但它是东方走向繁荣的起点,而非西部重新振兴的契机。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的首都由罗马迁往波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希腊旧城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一行动表明帝国中心已经东移。

^① J. W. Barker,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Madison, 1966, pp. 16—17; L. B. Moss, *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 Roman Empire 330—717*,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V, ed. by Hussey, Cambridge, 1966, pp. 23—25.

从这个时期开始,一个新型帝国在原来的罗马帝国框架内已经形成。^①

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西部拉丁文化区,由于内部社会矛盾和外部蛮族入侵的双重打击,已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穷途末路。5世纪后半叶,帝国西部的统治覆亡于蛮族入侵的洪流中,帝国正统中断。新的东部帝国虽也遭受了蛮族的入侵,但凭借着其地理和社会优势,^②以及灵活的外交策略,^③顶住了内部危机和蛮族入侵的冲击而生存了下来,并且显露出勃勃生机。从5世纪起,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部地区经过马尔西安(Marcian, 450—457)、列奥(Leo I, 457—474)、芝诺(Zeno, 474—491)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帝国在内政外交上都已渡过难关,走上了复兴之途,到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 I, 491—518)时代,帝国已经从蛮族入侵造成的破坏和萧条中恢复过来。到查士丁一世(Justin I, 518—527)和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527—565)时代,一个新的强大帝国已经初步形成。

复兴起来的东部新帝国已经显示出与从前它所从属的罗马帝国西部的不同。^④其最为明显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在这个由基督教(东正教)统治的新帝国里,希腊文化逐渐抬头。425年重新扩建的君士坦丁堡大学设有

^① 布朗宁认为,新首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帝国的分裂,毋宁说象征着新的统一。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London, 1971, p. 22. 这种观点大概是基于帝国政权仍然保持表面上的统一。其实,无论在政治结构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变化已经孕育起来。布里虽然坚持认为罗马帝国从开始到1453年一直未曾间断,但他认为,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希腊文化(Hellenism)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拜占庭化”(Byzantinism)确实开始于4世纪……某些特点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后很快就开始显现出来。”Bury, Introduction,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IV, part I, Cambridge, 1966, pp. xiv-xv. 贝尼斯和莫斯认为:“从君士坦丁(337)到希拉克略(641)是拜占庭帝国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拜占庭与西部的利益逐渐脱离开来,7世纪时随着近东的变迁以及其内部结构的相应变化,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面貌。”N. H. Baynes & L. B. Moss, *Byzantiu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ast Roman Civilization*, Oxford, 1961, pp. 3—4.

^② 有一点可为说明:拜占庭帝国的欧洲边境线不太长,且防卫优良,而日耳曼人入侵者正是从欧洲方向而来。在东部帝国,拥有大片地产的大元老院土地所有者虽也分布广泛,但较之西部为少。在西部帝国,那些半独立的大贵族削弱了中央政府在各地的统治,他们不惜背叛皇帝的统治,以求在新的蛮族统治下保持他们的财富。东部帝国在其亚洲省区的税收和财富、人力资源没有受到蛮族入侵的破坏。J. W. Barker,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 29.

^③ 例如,430—440十多年间,阿提拉的入侵和威胁被拜占庭帝国成功地以外交手段加以收买而解除。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395 AD to 800 AD)*, Vol. I, Amsterdam, 1966, pp. 161, 213—223.

^④ 莫斯认为:“罗马帝国西部的崩溃提高了东部省份的地位,这些省份总是声称这里居住的群体比意大利的征服者更富庶、更文明。随着西欧贸易、工业和城镇生活的衰退,税收的停滞和蛮族国王统治下中央政府大部分机关的消失,东罗马成为出色的城市,幸存的绝无仅有的古典国家……君士坦丁堡逐渐吸引了地中海东部的文化活动。”L. B. Moss, *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 Roman Empire 330—717*,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V, p. 4.

希腊文语法和修辞学的教席,数量超过拉丁文语法和修辞的教席。^① 6世纪上半叶查士丁尼时代编纂的《民法大全》是由拉丁语写成,但后期的《新法典》却几乎全由希腊语完成。查士丁尼在其中说:“我们以口语用的希腊语,并非以母语(指拉丁语——引者)写下这个法令,为的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它。”希腊语取代拉丁语有一个缓慢的过程,查士丁尼时代开启了希腊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过程。实际上,拉丁文的《民法大全》中有大量的希腊语写成的注解。^② 在拜占庭帝国,官方使用拉丁语,而民众生活使用希腊语的状态,在希拉克略(Heraclius, 610—641)时代彻底改变,希腊语作为教会和民众交流的媒介成为官方语言,拉丁语不久就几乎被人遗弃,即使在有教养的团体和阶层中也很少使用了。^③ 不过,在最初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仍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所以后世史学家称之为东罗马帝国。在西部帝国灭亡后,这个东部帝国历经一千余年的风风雨雨,最终国力衰竭,于1453年灭亡于后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罗马帝国正统在西部中断以后,以君士坦丁堡为政治中心的这个帝国,在政治结构和文化性质上已经脱离了罗马帝国的既定轨道,成为一个融合了罗马政治观念和希腊文化遗产、以东正教为意识形态的新帝国。为了标示这个新帝国的独特性,又将它称为“拜占庭帝国”。

二、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

就中国对希腊罗马世界的知识以及与它的联系而言,大部分情况下涉及到“拜占庭帝国”势力所及的地区,即地中海东部地区。这个地区最早为中国人所注意,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当时中国人称之为“黎轩”,稍后则有犁鞞、犁鞞、犂鞞等不同写法,但其为同名异译,至为显然。关于这个名称的起源乃至地望,学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我认为,它很有可能转自Seleukian (Σελευκίαν),意为“塞琉古的”,指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形成的塞琉古帝国。随着罗马帝国的势力扩张到地中海东岸,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

① 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42页。

② M. Maclagan, *The City of Constantinople*, London, 1968, p. 43.

③ 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庭帝国》,第55、85页。

名称大秦。^①后来这个地区更以“拂菻”之名见称，又被分别写作“拂憺”、“拂临”等形式。北朝史籍又作“蒲林”、“普岚”等形式。“拂菻”一名最早于4世纪初出现于中国史籍，与从前的大秦同时并用。这个事实说明当时的中国人获得了希腊—罗马世界的新消息，但不清楚这两个名称所代表的国家之间是何种关系。从6世纪初叶起，中国文献材料中“拂菻”一名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向拜占庭帝国。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在秦朝混一宇内，建立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公元前221—前207)之前，中国作为诸侯邦国已经存在了很多世纪。秦帝国的建立，使统一政权的统治范围北及长城，南达福建、两广及印度支那，西至青藏高原东缘。继秦帝国而起的两汉帝国延续其统治达四百年之久。西汉帝国自公元前2世纪末以后持续不断的开疆拓土，尤其是向中亚的扩展，使塔里木盆地周围的新疆地区——即狭义上的“西域”——处于中原政权的控制之下，大大拓宽了中原人民的域外知识，包括希腊世界的消息。西汉末年中原动荡，打断了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进程；东汉王朝继起，经营西域的事业在公元1世纪最后三十年和2世纪初再次展开。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由于班超经营西域的成功而空前畅通，使罗马帝国获得更多丝绸等中国物产，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中国知识。

几乎与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同时，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国力衰退的时代。184—215年的黄巾起义，东汉帝国中央政权倾覆，国家陷于混乱。随后而来的是魏、蜀、吴三国并立以及西晋(265—317)的短暂统一。中国北部陷于入侵的游牧民族之手，317年晋朝的南迁，使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帝国——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政治形势呈现出极大的相似性。迁都南京后偏安的东晋王朝，与罗马帝国分化出来的拜占庭帝国一样，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所不同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古希腊文化传统的复振，而东晋的定都建康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带陷于游牧民族之手。不过，与蛮族政权建立后罗马帝国西部的蛮化所不同的是，统治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迅速同化于发达的中原文明，特别是439年突厥拓跋部建立的北魏(386—534)统一北方各小王朝后，中国北部

^① 见张绪山：《近百余年来黎轩、大秦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3期。

逐渐发展、繁荣起来。^① 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534—550)和西魏(535—556),而二者又分别于550年和557年为北齐(550—577)和北周(557—581)所取代。与此同时,中国南部则先后历经四个王朝: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继起的隋朝(581—618)以及它在589年的一统天下,标志着中国进入统一的新阶段。隋朝的政治成果为生机勃勃的唐朝(618—907)所继承。

希腊罗马世界对于中国的知识,有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赛里斯(Seres)一名通常被学界认为是希腊罗马世界最早用来指示中国的名称,其实,这种联系是后来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最初并无确切的联系,^②即使在公元前后也只是模糊地指称那些丝绸贸易的经营者。法国东方学家戈岱司(G. Coedès)辑录和研究希腊罗马古典作家有关东方的记载,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一名词明显地起源于东亚,那么它就是相继或者同时指一些差别大的部族,对于西方人来说,所有生产和贩卖丝绸者都是赛里斯人。……这一术语实际上是泛指许多种族的。”同时,他根据罗马作家普林尼有关赛里斯人“身材高大,红头发,蓝眼睛”的记载,认为赛里斯人居住的地区应在“突厥斯坦”。^③ 后来,赛里斯这个名称逐渐成为希腊罗马世界从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线(即狭义的“丝绸之路”)接近中国时对于中国的称呼;而秦那(Thina, Cina)则成为他们从海路方向接近中国时经常用来称述中国的名称。^④ 6—7世纪的拜占庭文献称呼中国的名称,是“秦尼斯达”(Τζίνιστα,拉丁文转为 Tzinista)、“秦尼扎”(Τζίνιτζα,拉丁文转为 Tzinitza)及桃花石(Ταυγάστ,拉丁文转为 Taugast)。不过,传统的“赛里斯”名称并未完

① 李约瑟注意到这种相似性,认为:“公元303—535年间,中国北方有不下十七个小王朝相互争斗……在这个时期,‘蛮族’的汉化远甚于北方汉人的蛮化。胡服无疑大为流行,但汉人的农业和行政制度仍然继续着,蛮族的风俗逐渐改变;通婚广泛盛行,并且受到鼓励,蛮族首领的多音节姓氏也改成了汉姓。……威廉(H. Wilhelm)把这一点与日耳曼各部落对晚期罗马帝国的人侵进行比较,发现入侵者既不能保持它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能充分采用被征服帝国的文化。他的解释是,罗马帝国的文化根基在劳动民众中非常浅薄,无法抵御蛮族的冲击;相反,即使在汉代中国,其文化已深深根植于广大的农民人口中,这些人的标准实际上是传统的儒家和道家价值观。根据我自己在华体验,我很赞同他的见解。”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 Cambridge, 1988, p. 119.

② 公元前4世纪希腊作家克特西阿斯(Ctesias),提到赛里斯人异乎寻常的高大身材和长寿命:“据说,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有人见到过他们,有十三腕尺之高;可以活到二百岁。”但这段文字仅见于《福提乌斯文库》(*Bibliotheca of Photius*),使人怀疑是否真的出自克特西阿斯之手。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I, London, 1915, p. 14.

③ 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12、14页。

④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p. 1.

全消失。

三、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交往路线

在整个古代时期,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交往主要有三条路线:北方欧亚草原之路,中部亚洲绿洲之路和南部海上之路。这三条交通线有时均被冠以“丝绸之路”的名称,或者分别称作“北方丝绸之路”、“中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但严格意义的“丝绸之路”是指中部亚洲绿洲之路。在北方欧亚草原之路的交流中,由于皮毛贸易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学者又以“皮毛之路”称呼这条交流线;在海上之路的交流中,瓷器贸易发挥过重要作用,故“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瓷器之路”。

北方欧亚草原之路的存在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这条道路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东西两段交汇于阿尔泰地区。东段从华北(内蒙古草原的河套地带)地区出发,跨越戈壁沙漠、蒙古草原,由准噶尔山口到达阿尔泰地区。中国古代传说《穆天子传》,^①新疆天山腹地的乌鲁木齐市南的古墓中发掘出中原地区春秋时代的丝绒制刺绣绢,^②前苏联境内巴泽雷克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的丝绸,^③说明中原地区从很早就与这个地区保持着联系。这条道路的西段经由南西伯利亚草原,沿咸海、里海北部,到达黑海沿岸。根据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的记载,公元前7世纪一位名叫阿里斯铁(Aristeas)的出生在马尔马拉海的普洛康奈斯岛(Proconnesus)的希腊人,曾经从亚速海出发经南俄草原到达阿尔泰地区,为的是寻找阿波罗喜爱的“希坡博里安人”(Hyperboreans,意为

① 这部古籍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被埋于墓中。由于书中记载的神话成分,其史料价值被长期否定,随着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增多,它的史料价值又被重新肯定。参见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3期(1990),第19页。

② 1987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天山腹地的乌鲁木齐市南的古墓中,发掘出一件保存精良的风鸟纹绿色丝绒制刺绣绢,经鉴定为中原地区春秋时代产品,具体年代为公元前642±165。此外,在同一墓地其他墓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先秦墓葬中,还发现了中原丝制物遗迹、中原风格的各种漆器和铜镜等。见白建钢等:《中西文化交流史迹考古新材料证实,丝绸之路的开辟可追溯到春秋以前》,《光明日报》1987年2月8日。

③ 鲁登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37—48页。

“北风以外的人”)。有学者认为,“希坡博里安人”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国人。^①公元前4世纪晚期亚历山大东征到达中亚时,这条道路的西段仍在发挥作用。^②

从公元前2世纪末,由于汉代中国势力向西域的扩展,特别是匈奴对欧亚草原之路东段的强力控制,中国与西方的联系往往经由南俄草原段进行,即: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北缘,跨帕米尔高原,到达药杀河流域,然后经威海、里海之北,达到黑海沿岸。公元3世纪初,由于中亚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匈奴的西迁,除了已开辟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外,又开通了一条由天山北麓经乌孙(伊犁河)、康居(楚河),沿威海、里海北岸到达黑海沿岸和罗马帝国的道路,史称“北新道”。在这些世纪里,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这条道路上的一些游牧民族进行。6世纪下半叶,强大的突厥帝国在中亚地区建立,控制了从蒙古高原到黑海沿海的广袤地区,尤其是,568—576年间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为对付共同的敌人波斯帝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大大便利了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这种交流随着阿拉伯对中亚的征服而减弱、中断。

在古代晚期和中古时期的东西方交流中,中部亚洲绿洲之路(或简称为“丝绸之路”)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条交通线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至玉门关、敦煌,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到达喀什噶尔,越葱岭至大夏,经伊朗高原北境至地中海东岸。中国的大宗丝织品运抵地中海东岸后,再从那里发送到罗马帝国。从地理形势角度,丝绸之路大致分为东西两段,以葱岭为界;西段的部分里程与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路线大致相合。公元前2世纪初,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公元前250—前160)处于鼎盛时期,疆域北部扩展到了锡尔河沿岸,南部达印度河下游,据斯特拉波(Strabo, 公元前58—公元21)称,向东的扩展,“远达 Seres 人和 Phauni 人的地方”。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一时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可能与汉代控制的塔

^① E. M.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1913, p. 113; E.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 1931, pp. 27—52; I. M. Frank and D. M. Brownstone,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New York, 1986, pp. 67—69; 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 pp. 170—171.

^② 公元前329—前328年,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大夏)过冬时,花刺子模国王法拉斯马尼(Pharasmane)访问亚历山大,建议陪同他从北面一直打到黑海北岸去。这一建议的根据是在威海以北,存在着一条商路。见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3页。

里木盆地两缘有过政治和经济的联系。^① 不过,真正将东西两段连为一体的,是张骞于公元前 139 年和 119 年进行的两次中亚探险。在中亚居留期间,张骞在“黎轩”的名称下获得了一些有关希腊罗马世界的消息。公元前 104—前 101 年李广利完成了对药杀河流域上游的大宛国的征服,在这里,李广利的军队可能驻扎在 227 年以前亚力山大大帝安营扎寨的地方,有可能接触到当地的希腊人后裔。亚力山大的东征到达帕米尔和旁遮普,使希腊人居留在西亚,把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合成为一个世界,与地中海各地发生相互交往,但没有开辟一条去中国的道路。中国仍旧是分离的,与世隔绝的,完全不为希腊世界所知。这一间隙的沟通,不是从西方而是从东方,不是由波斯或希腊人,而是由中国人完成的。正是中国人,最初由于开拓外交关系,后来又以武力闯入了这片地区。^②

自公元 1 世纪,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之间沿丝绸之路进行的物产交流开始具有一定规模。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多,双方开始了直接交往的努力。从中国方面,西域都护班超于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 97)派遣部下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大秦)。甘英途中受阻于波斯西部边境的船工而折回,未抵大秦之境。但他从波斯船工那里听到了希腊神话中可怕的海妖故事,并带回中原,遂使中国正史中增加了一段希腊神话。^③ 甘英西行,对中国人域外知识的扩展有重要影响。《后汉书·西域传》:“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

① 学术界对斯特拉波的记载有两解,一者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人越过葱岭,征服了塔里木盆地较近的一些绿洲,与塔里木盆地贩丝的民族发生接触;另一种见解认为希腊人只是同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发生了联系,并非有版图隶属之事。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Seres(赛里斯人)在后来的希腊—罗马文献中意即“丝国人”,但这里的 Seres 是指帕米尔两侧经营丝织物贸易的中介人,并非特定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一点可由普林尼提到的 Seres 人“红头发、蓝眼睛”这一特征得到证实。而 Phauni 则可能是匈奴人。参见 Στράβωνος, Γεωγραφικά, XI, II, 1;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 58; 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第 64 页。

② G. F. 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p. 66—67; J. Edkins, What did the Ancient Chinese Know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 (1883), pp. 5—11.

③ 关于甘英西使大秦,最基本的史料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和《晋书·四夷传》。对这两段文字加以综合,可以较完整地复原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故事。详细考证,见张绪山:《甘英西使大秦获闻希腊传说考》,《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2 期;及同作者:《〈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一段希腊神话》,《光明日报》2006 年 3 月 22 日。

从罗马帝国方面,随着帝国版图向地中海东岸的扩张,罗马上层贵族对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中国丝绸的兴趣日渐浓厚,商人阶层中已有人开始探索通往中国丝源的道路。大约在公元100年,一位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曾派自己手下一批人到东方经商。^①梅斯的手下人沿丝绸之路抵达巴克特里亚和某个称作“石塔”的地方,在那里收集到一些关于赛里斯国(Seres)的消息。^②随后数世纪中,波斯成为中国和罗马之间不可逾越的中介者,直到6世纪上半叶这种状况都没有改变。

南部海上之路通过波斯湾、红海和印度洋连接地中海东部和东南部,同时连接中国化的印度支那和中国南部。在汉武帝的开疆拓土行动使中国与西方发生联系,以及罗马帝国向东方进行探索以前,这条交通线上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是以中国与印度、希腊与印度的交流为前驱的。希腊与印度的联系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当时印度的孔雀被输送到希腊。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孔雀王朝(公元前320—前180)与塞琉古、托勒密王朝的互换使节,加强了两个世界已经存在的联系。^③公元1世纪下半叶,一位出生在埃及的希腊人,周航过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根据航行印度所搜集的资料,写成了《厄里特里亚海周航记》。^④这位佚名作者在“秦”(Θηός, Thin)的名称下提到中国和中国的著名产品丝绸:“在此国(金洲)的后面,大海延伸过去至秦(Thin)的某处而止,在秦国的内陆北部某处,有一称为秦奈的大城,生丝、生线和其他丝织品由彼处陆运,过巴克特里亚抵婆卢羯车,另一方面又从恒河水道运至利穆里。但

①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p. 188; 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21页。

② 一些学者认为梅斯的代理人达到了汉代东都洛阳。如,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29—430页;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杨共乐:《谁是第一批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及同作者《“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其实未必。相关讨论,参见张绪山:《关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中国”问题的一点思考》,《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③ E. Warmington,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dia*, London, 1974, p. 35; G.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1951, pp. 7—9.

④ W. H. Schoff (tr. & ed.),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Travel and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by a Merchant of the First Century*, London, Bombay & Calcutta 1912;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p. 183; 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第166页;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第18页。

去秦国是不容易的,从那里来的人也很少。”^①“秦”(Θεῖος, Thin)这个称号与印度对中国的称呼 Cina、Cinastan 是一致的,相当于中国西南部(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交接地区。^② 公元 2 世纪前半叶,一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从孟加拉湾绕过马来半岛到达了交趾(Kattigara,位于红河入海口处附近,今河内城郊);^③《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永宁元年(公元 120),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东汉朝廷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同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梁书·诸夷传》记载:“其(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同时又记载罗马帝国商人与东吴的一次交往:“孙权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歛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入。’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④又,《晋书·四夷传》记载:“武帝太康中,其(大秦)王遣使贡献。”此次遣使可能发生在太康五年(284)。^⑤ 这些文字记载,以及越南南部金瓯角的古海港奥克·艾奥(Oc-èò)遗址发掘中发现的大量中国、印度和罗马物产,^⑥都表明罗马在海上交通线上向东方的商贸活动状况。此后,罗马

① W. H. Schoff, tr. & ed.,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64;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p. 183.

② 见戈岱司,前揭书,第 17—18 页。

③ 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p. 193; 戈岱司,前揭书,第 23 页。

④ 关于秦论来华的讨论,见许永章:《大秦商人秦论来华若干问题探讨》,《北大史学》第 4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45—53 页。

⑤ 《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记载:“惟太康二年(281),安南将军广州牧滕侯作阵南方,余时承乏,忝备下僚。俄而大秦国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叶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而不溃烂。太康五年(284)大秦献三万幅。帝以万幅赐阵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很有可能,这些纸与火浣布是由同一个大秦使团带来。他们从叙利亚经海路(锡兰)至安南,在安南将携带的本国商品售出,然后在当地购得一些蜜香纸和火浣布以进献中国朝廷。见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Leipzig & München, Shanghai-Hongkong, 1885, pp. 119—120.

⑥ 1944 年法国学者路易·马勒莱(Louis Malleret)在此地进行发掘。在这个海港遗址发掘出的物件中,有许多印度和中国的产品,中国物产中包括西汉的规矩镜、东汉三国时期的八凤镜等。罗马特产包括 152 年和 161—180 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以及罗马或仿罗马式金银装饰品、雕像中安敦时代的风格,表明 2 世纪中后期是罗马帝国与东方交往的高潮时期。研究者认为,“公元初的 2、3 世纪奥克·艾奥地区的工匠按纯罗马风格制造凹型雕刻,能够重现先进的罗马工艺”。L. Boulnois, *The Silk Road*, tr. Chamberlin, London, 1966, pp. 102—104.

人的活动在中国文献中逐渐消失。这种文献信息的缺失恰与3世纪危机相吻合。

中国与印度在海路上的联系,就明确的文字资料证实而言,可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中国人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绕过印支半岛,“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国,“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同书《平帝纪》又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支国献犀牛。”黄支国即印度东南岸的古城 Kanchi,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建志补罗(Kanchipura),今之康捷瓦拉姆(Conjevaram)。^① 3世纪以后中国的航海活动得到迅速发展。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中国与印度和锡兰逐渐建立正常联系。通过中间民族的媒介,中国物产和希腊罗马世界的物产(主要是拜占庭帝国的物产)得到交流。《宋书》卷九七:“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船继路,商使交属。”从6世纪开始,海路的重要性更为明显。8世纪以后,由于阿拉伯人的东来和唐代中国人向西方经商范围的扩展,东西方海上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此后海路在东西交往中的作用逐渐超越陆地上的丝绸之路。^②

四、中国与拜占庭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是国际“拜占庭学”中后起的研究领域,同时又是中西交流史,尤其是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交流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从19世纪下半叶至今,大约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其研究者主要是西方的汉学家和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中国学者。

中国—拜占庭关系研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资料性研究,主要集

^① 见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考》,何健民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3—117页;戴闻达:《中国对非洲的发现》,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页。有的学者虽有不同见解,但也把黄支国考定在印度东岸,如恒河口。见P. C. Bagchi,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India*, ed. Nilakanta Sastri, Bombay 1957, II, p. 772; O. W. Wolters,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 New York, 1967, p. 268, n. 15.

^② 关于海路上东西交往的情况,详见张绪山:《罗马帝国沿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第87—92页。

中在基本资料的搜集和基本史实的考订上；二是专题性研究，这类研究又可分为著作中相关的论述和论文专论；三是通史性专论，即以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交流史为主、论述范围较全面的论著。

在最近百余年中，第一类成果，即涉及原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的资料性研究，是最基础的工作。在这方面，夏德(F. Hirth)、裕尔(H. Yule)、戈岱司(G. Coedès)、张星烺等学者可为代表。

夏德是德国著名汉学家，他于1885年出版名作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Leipsic & München, Shanghai-Hongkong, 1885)，搜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几乎全部的汉文史料，并对史料所涉及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关系的基本问题(如大秦、拂菻等地理名称和华丝西传路线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被认为是第一本全面论述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关系史的著作。^①与此前的汉学家不同的是，精通汉语的夏德，在他的著作中将原始汉文史料附在英译之后，以便接受人们的批评；他以这些史料为基础的详尽考证，包括他对有关拜占庭帝国历史地理的考证，成为此后研究的新起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裕尔是英国东方学家，他于1866年出版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1866)两卷。这一著作包括马可·波罗以前西方作家有关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原始文献资料和此前翻译为西方语言的汉文资料的考证研究，“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1913—1916年，《西域纪程录丛》一书经法国汉学家考迪埃补充修订，资料更为详备，成为四卷本的巨著，其中也有关于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交流史的论述。^②

与夏德的做法相类似，法国东方学家戈岱司则于1910年出版 *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 l'Extrême-Orient, depuis le IV^e siècle av. J. C. Jusqu' au XIV^e siècle* (Paris, 1910)，^③将古代希腊—罗马作家有关远东(尤其是中国)的资料尽力网罗，其中包括了拜占庭帝国时代各作家有关中国事物的记载，成为研究希腊—罗马世界东方知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① 该书由朱杰勤中译，名作《大秦国全录》，196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H. Yule & H.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I-IV, Nendeln Liechtenstein, 1967; Taipei, 1966, reprinted Taipei, 1972. 该著作第一卷由张绪山中译，名作《西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华书局2008年再版。

③ 该书由耿昇译为中文，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